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文化体验 城市、公民与历史

Urban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EXPERIENCE:
CITIES, CITIZENS AND HISTORIES



第 16 辑
都市文化研究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文化体验
城市、公民与历史

Urban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EXPERIENCE:
CITIES, CITIZENS AND HISTORIES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体验：城市、公民与历史/苏智良，陈恒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7. 12

(都市文化研究 16)

ISBN 978-7-5426-6104-3

I. ①文… II. ①苏…②陈… III. ①城市文化—研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5045 号

文化体验：城市、公民与历史

主 编 / 苏智良 陈 恒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惠敦科技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0.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104-3/C·565

定 价 / 6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

主 办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全球城市与世界文明传承研究基地

主 编

苏智良 陈 恒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旭 王安忆 王晓明 许纪霖 孙 逊 杨远婴 杨剑龙 陈思和
周大鸣 钱文亮 唐力行 葛剑雄 詹 丹 熊月之 潘建国 薛 义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阶段性成果

CONTENTS

目
录

城市史与城市研究

1. 内亚草原帝国城市缘起的多个层次 唐 均 3
2. 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化与现代市政设施的构建 徐继承 12
3. 从《防烟》看 17 世纪伦敦空气污染及其当代启示 谢 超 25
4. 列宁的城市观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由来 邓 杰 39
5. 日本近代城市改造中民众角色的变迁 郭小鹏 55
6. 埃尔斯沃思·亨廷顿文明与气候关系思想研究 顾海萍 66
7. 北非国家的挑战：阿拉伯之春与城市治理
..... [法]盖尔·吉洛特 让·伊夫·莫伊森 77

城市与社会

8. 两宋时期城市中的密教信仰
——以宋代笔记为中心 夏广兴 申一平 鲍静怡 89
9. 城愁与乡愁的变奏——新世纪初文学空间的镜像表达 苏喜庆 102
10. 企业家精神与社区戒毒康复社会工作创新 雷海波 费梅苹 113
11. 英语世界对成都文化传播的接受研究：国际视野与战略再
思考 李 泉 127
12. 中国进入南亚：基于文化深读和自我发展镜像的新
视野 周 雷 150

艺术中的都市文化

13. 颜文字的图像语义探析 郑 欢 张子斌 169
14. 城市公益广告说服策略研究——以霍夫兰“说服
模型”为框架 周 韧 宁自冉 190
15. 无一物中无尽藏 有山有水有楼台 高 筠 203

评论

16. 城市研究者的话语制造：从“全球城市网络”
到“超凡城市” 陆伟芳 219
17. 近 30 年来美国市政研究的新进展 曹升生 228
18. 用缠绕的结绳编织成长与坚守 陈劲松 245

光启学术

19. 强制阐释论 张 江 257
20. 红楼梦是怎样开头的 詹 丹 279
21. 意象艺术与唐诗 陈伯海 谭轶斌等 307

城市史与城市研究

内亚草原帝国城市缘起的多个层次

——基于女真文所记相关术语的源流爬梳

唐 均

摘 要：作为阿尔泰语系留传至今为数不多的古代语文材料之一，现存女真文记录的四个城市术语系列，三个在女真人的意识形态中具有显著的城市语义指向，还有一个在突厥—蒙古语中明确体现为城市。它们分别从作为军事要塞的“城堡”、凸显城市界限的“城池”和源起贸易行为的“城市”三个层面，揭示了内陆欧亚这一特殊区域中发展起来的草原帝国畛域之内，作为文明发生和维持中心点的城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内亚 草原帝国 城市起源 女真文

根据迄今在中亚研究领域成就最为卓越的学者之一美籍匈牙利人塞诺(Denis Sinor, 1916—2011)的意见，内亚(Inner Asia)作为学术概念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实在太广，无法用统一的经济生态或自然环境来定义，但其生命力恰在于这一巨大的区域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成为挑战欧亚各大文明的蛮族的活动舞台，来自内亚的蛮族与传统文明承载者之间的冲突对抗与交流互动，构成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主线^①。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则是实际上可以置换内亚的另外一个概念，在空间上大致是旧大陆位于伟大定居文明不断变动的边界之外的一部分，由此主要凸显在这篇区域活动的游牧民族

^① 郑诗亮(2016)：“钟焯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5月8日。

和渔猎民族等蛮族^①。

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es)是20世纪法国人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在其同名撰述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从欧洲西海岸的法国中部,一直到亚洲东北部的日本海以西的空间范围内,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斯基泰人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到18世纪中叶的蒙古人汗国这一时间范畴内的游牧民族文明形式发展变迁的统辖;这些游牧人群迁徙、袭击和进攻毗邻地带的行为方式及其内在动机,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去解释的话,就特别彰显自然法则对草原民族迁徙、征战等重大军事行动的决定作用^②。因此,草原帝国的概念,可以用来指称中央欧亚(不限于游牧)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种特征表现。

其中的阿尔泰语系民族,自西向东涵盖了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广义上还包括了朝鲜人和日本人。这里要涉猎的,是本以渔猎为生而在12世纪初期崛起的东北亚土著民族——女真人,他们在毗邻先进的中原汉文明和塞北契丹文明的强烈影响下,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留下来用这种汉字式女真文字记录的一些材料。

在明代永乐年间镌刻立于奴儿干都司的汉—蒙—女真三体石碑《永宁寺碑》第3行,出现了意指“部落”的一个女真文词汇 **𐰺𐰸** *fa-lia^③,其对应满文词汇 falga“一佐领人聚会场所,宗族、乡党”^④相较而言在发生学上显得还要古老一些,因为历时音变呈现 * -g/γ- > * -i/j- 的情形^⑤而非相反。

这个满文词汇 falga,仅以其可能存古的核心内涵“一组房屋”而推演至原始通古斯语形式 *palVga“一组房屋”^⑥,从而归于原始阿尔泰语形式 *piǎlagV“要塞、一组房屋”的衍生形式之一,并行的情形还包括以下语汇^⑦:

-
- ① [美]丹尼斯·塞诺(2006):《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北京:中华书局:第3—5页。
- ② 纪宗安主编(2002):《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与华侨华人论集:中外关系史名著提要》,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第297—299页。
- ③ 金光平、金启琮(1980):《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第359页。
- ④ 孙昊(2014):《辽代女真族群与社会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第132页。
- ⑤ [美]N. 鲍培(2004):《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周建奇[译]、照日格图[审校],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第249页。
- ⑥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Part One to Three*, with assistance of Ilya Gruntov and Vladimir Glumov. Leiden • Boston: Brill: p. 1092.
- ⑦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Part One to Three*, with assistance of Ilya Gruntov and Vladimir Glumov. Leiden • Boston: Brill: p. 1092.

一、原始突厥语形式 * bialik“城市、要塞”——由鄂尔浑突厥文—回鹘文—喀喇汗文—中古突厥语 baliq、西部裕固语 baliq“围墙”~paluq、哈拉吉语 baluq“村子”、楚瓦什语 püler 等材料支撑；

二、原始蒙古语形式 * balaga-sun“城市、要塞”——由蒙文 balayasun~balyasu(n)、中古蒙语 balaxasun~balaqasun~bal(a)γasun~balγasun、喀尔喀语 balgas、布里亚特语 balgāha(n)~balgān“茅舍”、卡尔梅克语 balγəs n、鄂尔多斯语 balGasu~balGus、达斡尔语 balga~balag“房屋、住处”、土族语 ba(r)Gāsə~warGāsə 等材料支撑，并留意蒙古语借入埃文基语 balayan~balgahun 等、借入俄语 balagán，俄语借入雅库特语和埃文语 balayan；

三、原始日语形式 * pái“炉、家、户”（由古日语 pe、中古日语 fé、现代日语 ihe“户”等材料支撑。

更进一步，上述阿尔泰语共同词汇还可能追溯到更为底层的乌戈尔语词根 * palV“村子”——参见沃古尔语 pāβl、奥斯恰克语 pūγəl、匈牙利语 falu 乃至芬兰语地名构词成分 palva-等材料的支撑^①。

由此可见，这个在突厥—蒙古语中得以彰显的城市术语，具有（历时发生）遥远而（空间延宕）广袤的语源积淀。从“一组房屋”到“村庄”再到“城市”的语义变迁，勾勒出城市空间拓展的简洁脉络。而“城市”和“要塞”在大多数突厥—蒙古语中的并行不悖，则反映出典型草原民族游牧征伐帝国行为的空间据点，作为鄂尔浑突厥语子遗成分最为丰富的现代突厥语，西部裕固语中“围墙”的语义很可能就是基于此的转义了。而其较为原初的语义“房屋、村子”，往往还遗存在游牧特征已不显著的森林民族（如通古斯人以及满洲化程度很高的达斡尔人），或者是住地较为封闭的民族（如哈拉吉人、日本人）的语言中。

同样是在明代永乐年间刊行的民族语文辞典《女真译语·杂字》中，出现了三个较为明确释义的城市术语。

《女真译语·地理门》记录的“城”**朶亦杀**^② * hecen^{cen}-ni，其实已是带有属格标记 杀 * ni 的形式了，这一点从金代中后期镌成的女真文《奥屯良弼诗

① [美]丹尼斯·塞诺(2006)：《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北京：中华书局，第354页。

② Grube, Wilhelm (1896)：《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üen. Leipzig: Kommissions-Verlag von O. Harassowitz; p. 2.

碑》第11行中略有变化的异写形式 **朵弥** ① * he čen^{cen} 可以推知，而其更早的形式，则要归于金朝初年《女真文字书·宫室门》中的 **朵** * he čen 一词②。这个女真文词有其满文对应词 hecen，进而还可联系到稍早的辽代民族文字——契丹小字形式 **𐰚𐰝** * h-č=he č“方、境”③：**𐰚𐰝𐰚** * h-č-n=he čen“疆境”（属格）、**𐰚𐰝𐰚𐰚** * h-č-n=hečeni“方、境”（属格）④，以及与契丹语关系可能最为接近的现代语文——达呼尔文 ke ci、达斡尔语 keč“边、堤、岸”⑤。

附带说一句，首见于唐人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中的族称“黑车子”⑥，其藏文转写形式为 gara-ga ṅlig，乃是突厥文 qara-qangliy“黑色的车”的对译⑦，因此，不可因为《女真译语》对“城”**朵弥杀** 的汉字注音是“黑车你”⑧而与此族称混同了。

根据达斡尔语的材料，上述契丹—女真语词似乎可以归于原始蒙古语形式 * keče“坡、斜、陡”——由蒙文 keč“坡”~keče“斜、陡”、喀尔喀语 xec“坡”、布里亚特语 xesi“斜、陡”、卡尔梅克语 kečə“坡”、东乡语 qeča“岸”等材料支撑⑨，再行上溯至原始阿尔泰语形式 * kēčá“倾斜”，与原始蒙古语形式并行的衍生情形则有如下语汇⑩：

- ①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2002)：《女真语言文字新研究》，京都：名善堂，第202页。
- ② 乌拉熙春(2001)：《〈女真文字书〉的复原》，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七)，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03页。乌拉熙春(2002)：《〈女真文字书〉的体例及其与〈女真译语〉的关系》，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八)，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7页。
- ③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2004)：《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京都：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第89页。
- ④ 刘浦江、康鹏[主编](2014)：《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北京：中华书局，第499页。
- ⑤ 那顺达来[编著](2001)：《汉达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13页（作 keq）。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Part One to Three*, with assistance of Ilya Gruntov and Vladimir Glumov. Leiden • Boston: Brill: p. 656.
- ⑥ 钟焄(2000)：《黑车子室韦问题重考——以〈会昌一品集〉与敦煌藏语文书为据》，《西北民族研究》第二期，第187页。
- ⑦ 钟焄(2000)：《黑车子室韦问题重考——以〈会昌一品集〉与敦煌藏语文书为据》，《西北民族研究》第二期，第191页。
- ⑧ Grube, Wilhelm (1896):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ücen*. Leipzig: Kommissions-Verlag von O. Harassowitz; p. 2.
- ⑨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Part One to Three*, with assistance of Ilya Gruntov and Vladimir Glumov. Leiden • Boston: Brill: p. 656.
- ⑩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Part One to Three*, with assistance of Ilya Gruntov and Vladimir Glumov. Leiden • Boston: Brill: p. 656.

一、原始突厥语形式 *Kač-“斜”——由土耳其语 kaçık、西伯利亚鞑靼语 qaɟaj-、哈卡斯语 xa ʒi-~xasxax“后弯”、绍尔语 qazır-“弯曲”、楚瓦什语 xo s-“弯曲”、图瓦语 xz šij-tir 等材料支撑；

二、原始通古斯语形式 *kečeri-“转、改变侧面”——由乌利奇语 kečeri-mbuči-、那乃语 kečeri-等材料支撑；

三、原始朝鲜语形式 *kj əch“侧面”——由中古朝鲜语 kj əch、现代朝鲜语 kjət [kjəth]等材料支撑；

四、原始日语形式 *kàntúa“犄角、角落”——由中古日语 kádó、东京方言 kádo、京都方言 kádó、鹿儿岛方言 kadó 等材料支撑。

这样看来，这个在女真—满洲语中得以彰显的城市术语，原来是从“倾斜的边境线”上矗立的一座座防御工事而衍生出来的，从而具有“城堡”的实际内涵了。即使在和女真人文化承袭关系分外密切的契丹人语言中，也尚未分化出具体的“城堡”语义来呢（当然，现存契丹文材料极为丰富而解读甚寡，所以这里的分析也是基于已有的契丹文字解读成果而言）。

《女真译语·地理门》记录的“池”**𡵓𡵓𡵓**① *χotoni，也是带有属格标记 **𡵓** *ni 的形式。从其《金史》汉字记音“和团 *χoton”②以及满文对应词 hoton 来看，这是意指“城池”的一个女真文词。而真正意指“池塘”的女真文词 **𡵓** *toŋ，见于《女真文字书·地理门》（作 *ton）③，反映的或许正是原始通古斯语形式 *tuŋ“湖泊、回水”，对应满文形式 tunggu“渊、潭”、埃文基语 tuŋer“湖”~tuŋuke“回水”、埃文语—涅吉达尔语 tōŋēr“湖”、乌德盖语 toŋi~tuŋi“湖”④，与此“池”实际上毫不相干。

由于注意到原始蒙古语形式 *koto“城镇、一组棚寮、家”及其衍生系列语汇——蒙文 qota(n)~qotu(n)“城镇、一组棚寮”、中古蒙语 qutan“栏”~

① Grube, Wilhelm (1896):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üen*. Leipzig: Kommissions-Verlag von O. Harassowitz; p. 3.

② 孙伯君(2004):《金代女真语》，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第220—221页（作 *hoton）。

③ 乌拉熙春(2001):《〈女真文字书〉的复原》，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七)，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01页。乌拉熙春(2002):《〈女真文字书〉的体例及其与〈女真译语〉的关系》，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八)，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46、157页。

④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Part One to Three*, with assistance of Ilya Gruntov and Vladimir Glumov. Leiden • Boston: Brill; p. 1436.

qoton、喀尔喀语 xot“城镇、一组棚寮”、布里亚特语 xoto(n)“城镇、一组棚寮”、卡尔梅克语 xotn~xotə“城镇、一组棚寮”、鄂尔多斯语 Goto“城镇、栈”、东乡语 ʔkide“家”、保安语 kute~kete“家”、达斡尔语 xoton~koton“城镇、一组棚寮”、东部裕固语 χoto“城镇、一组棚寮”、土族语 kudu“家”，兼及蒙古语借入柯尔克孜语和察合台语 qotan、借入埃文基语 koton 等情形^①，故而可以推知：女真文词根 **𐰺𐰸𐰾** *χotoni(以及满文词 hoton)当是借自原始蒙古语的词汇。

原始阿尔泰语形式 *kòtV (~k-, -u-)“村庄、地点”，与上述原始蒙古语形式并行的衍生语汇还包括^②：

一、原始突厥语形式 *Kutu“一群人”——由喀喇汗文 qutu 材料支撑；

二、原始朝鲜语形式 *kót“地方、地点”——由中古朝鲜语 kót、现代朝鲜语 kot[kos]等材料支撑。

从蒙古语诸形式凸显的“城镇”和“棚寮”并行特征看来，女真文辞显然借自原始蒙古语，表达的是“城池”之意，而其中中古蒙古语保留的“栏”义项，则反映出这一系列语汇内在的核心概念在于区域边界的突出——由此不难理解女真文辞书以表示护城河的“(城)池”来与之对译了。

《女真译语·地理门》中记录“市”的 **𐰺𐰸𐰾** *he rye，还以复合词形式见于 **𐰺𐰸𐰾𐰺𐰸𐰾** *he rye-ga“街”中^③。

由布里亚特语形式 erje 派生自原始蒙古语形式 *hergi-“旋走、绕行”——蒙文 erge~ergi-、中古蒙语 xergi~hirgi-、喀尔喀语—卡尔梅克语 ergi-、鄂尔多斯语 erge-、达斡尔语 ergi-(借自蒙文)~xergi~xorgi-、东部裕固语 heregdi-、土族语 xərgi-(民和方言)~xargi-(互助方言)、莫戈勒语 irga-“绕轴旋转、纺绩”以及蒙古语借入满语 erguwe 等、借入雅库特语 ergij、借入多尔干语 ergij^④，启发我们推

①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Part One to Three, with assistance of Ilya Gruntov and Vladimir Glumov. Leiden • Boston: Brill: p. 729.

②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Part One to Three, with assistance of Ilya Gruntov and Vladimir Glumov. Leiden • Boston: Brill: p. 729.

③ Grube, Wilhelm (1896):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ücen*. Leipzig: Kommissions-Verlag von O. Harassowitz: p. 3.

④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Part One to Three, with assistance of Ilya Gruntov and Vladimir Glumov. Leiden • Boston: Brill: p. 1137.

测上述女真文词可能借自某种目前已不可知的蒙古语形式。

原始阿尔泰语形式 *perkV“环扎、围绕”，与上述原始蒙古语形式并行的衍生语汇还包括原始通古斯语形式 *perke“捆绑、环扎”——由埃文基语 herke-、埃文语 herkb-、涅吉达尔语 xejke-、奥罗克语 pitu-“男式腰带”、索伦语 ekke-等材料支撑；另外，与此形似而实异的系列语汇有乌德盖语 xeke-、乌利奇语 xerke-、那乃语 xerke-，皆是借自满语 xergi-（〈原始通古斯语形式 *kerge-〈原始阿尔泰语形式 *kèra）^①。

据此可以推测，仅见于女真文记录的这个城市术语，反映的内涵乃是圈地围起、用于商贸活动的固定区域，久而久之才成为人群的定居点和活动中心，那么，这一基于商业行为而发展起来的人类定居物质景象，才是名副其实的“城市”。

城市的物质景象可以概括为：排列紧密的一簇簇建筑群将稠密的人口聚集在有限的空间内，其中的居民生产出可供交换的货物或服务，以便从其周围区域换取所需生活必需品；城市居民组成的社会，通常以其存在地区的公共建筑加以彰显^②。

只要在固定的区域内存在着某种有组织的集体生活，这样构成的一个居民社区仍然可以归为城市^③。从乌戈尔语“村子”到通古斯语“一组房屋”（以及日语“家、户”）再到突厥—蒙古语“城市”的一系列语汇，还有从突厥语“一群人”到蒙古语“一组棚寮、城镇”的又一系列语汇，正是内亚草原帝国渐趋成形历程中诠释城市基本内涵的最好注脚。

作为人类定居点的特殊形式，象征和再现城市不同寻常的物质形态就是城墙^④，西部裕固语中语义为“围墙”的词汇，与其说是自突厥语共同的城市术语退化而来，毋宁认为是保留了草原地带由“一组房屋”进化为“城市”过程中

①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Part One to Three, with assistance of Ilya Gruntov and Vladimir Glumov. Leiden • Boston: Brill; p. 1137.

② [英]阿诺德·汤因比(2015):《历史上的城市》，倪凯[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十四辑：城市史与城市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第1页。

③ [英]阿诺德·汤因比(2015):《历史上的城市》，倪凯[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十四辑：城市史与城市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第2页。

④ [英]阿诺德·汤因比(2015):《历史上的城市》，倪凯[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十四辑：城市史与城市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第2页。

城墙形成阶段的民族历史记忆片段。正是这些高大坚固的城墙,作为一道物质防护体将微小的城市区域和周围广袤的乡野区域区分开来加以庇护,一种不同于乡村原生态的新型社会生活方式得以逐渐形成^①。

在文明时代的早期,城市都是通过垦殖丛林沼泽而建立起来的物质核心和管理中心,从政治学的视角审视就是城邦,其周边地区的广延能够为这个唯一的城市提供足够的给养供应;但随着更多城市点的建立和扩张,各自的给养供应地不可避免会逐渐缩小乃至碰撞,从而必然导致各个具有主权意识的城邦之间产生难以弥合的分歧,为了消除这种分歧,管用的最终解决方法就是战争^②。内亚地区虽然幅员辽阔但地形总体平坦,作为人群主体的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这就需要更大的地盘才能满足庞大的流动人口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作为人类定居点的城市,即使在草原帝国成形之后,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同攻防要塞合而为一的特征,这在突厥—蒙古语城市术语系列的微观考察中体现得极为充分;而从“边境”引申出来的女真—满洲语城市术语,则是从宏观视野下俯瞰不同主权区域分界线上的一个个据点而生发出来的结果,类似的,凸显边界内涵的女真文术语“城池”,也是这种城市形成过程中边界意识浓厚的又一鲜明体现。

城市首先是安全,在此基础上才具有市民生活的自由,这样才能内在地向周围伸展、扩张和生长起来,而商业贸易恰是城市影响得以迅速扩展至遥远区域的重要行为方式,小型的苏美尔城邦乌尔的城市痕迹东至印度河流域、西达安纳托利亚就是一个典型实例^③,同样,在内亚地区,由满蒙语中共有的“围绕”系列语汇,衍生出仅限于女真语中出现的“城市”名词,可以给今人勾勒出一幅这样的图景:狩猎民族跑马圈地,将其限制为买卖交易场所,长此以往渐趋固定下来,这就形成了基于商品交易而生长起来的城市。

上述关乎女真文记录的四个城市术语系列,三个在女真人的意识形态中具有显著的城市语义指向,还有一个在突厥—蒙古语中明确体现为城市,它们

① [英]阿诺德·汤因比(2015):《历史上的城市》,倪凯[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十四辑:城市史与城市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第2、3页。

② [英]阿诺德·汤因比(2015):《历史上的城市》,倪凯[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十四辑:城市史与城市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第5—6页。

③ [英]阿诺德·汤因比(2015):《历史上的城市》,倪凯[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十四辑:城市史与城市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第2—3页。

分别从作为军事要塞的“城堡”、凸显城市界限的“城池”和源起贸易行为的“城市”三个层面,揭示了内亚草原帝国作为文明发生和维持中心点的城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同毗邻的传统文明之间既斗争又合作的复杂交流关系,在这个特殊区域内城市的缘起历程中仍然不时闪现。

Several levels of urban origin in Inner Asian empire of steppes: Based on the etymological approaches to Jurchen urban terms

John Tang

Abstract: Among few of the extant Old Altaic documents there are the four urban term series recorded in Jurchen script, of which three make point to a clear meaning of city whereas the other one reflects the obvious meaning of city in Turco-Mongolic languages. All these terms hold three etymological levels of “defending fortress”, “besieging citadel”, and “trading market”, indicative of how the city develop as center of civilization inside the empire of steppes of Central Eurasia.

Keywords: Inner Asia, empire of steppes, urban origin, Jurchen script

唐均,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